

C 大众传媒与现代中国（第二辑）

Framing Migrant Workers:
News Media and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in Transitional China

公民权的话语建构

转型中国的新闻话语与农民工

黄典林 著

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



黄典林，江苏南通人，获中国传媒大学和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双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主要研究兴趣包括社会理论与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传媒文化研究、传媒与社会边缘群体等。译作《数字化崇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编著《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格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大众传媒与现代中国（第一辑）

嬗变的新闻

—— 对中国新闻经典报道的叙述学解读

在“说”与“不说”之间

—— 上海沦陷区杂志《万象》研究

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

—— 《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

常识与洞见

—— 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研究

作为劳动的传播

—— 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

大众传媒与现代中国（第二辑）

公民权的话语建构

—— 转型中国的新闻话语与农民工

当代视觉文化透视

—— 历史、文化、权力、本体

南京国民政府与民营报业

.....

责任编辑：赵丽华

特约编辑：刘广东 朱晓瑞

封面设计：郭琳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亿万农民工是这一社会巨变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但同时也是以发展主义为核心的改革进程中的边缘群体。在以户口为核心的等级化公民权体系中，农民工群体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双重“他者”地位，如何修补这一群体所集中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裂痕，成为改革时代执政党——国家和以媒体为核心的公共论争的焦点之一。本书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对执政党——国家话语对农民工群体的意识形态重构，以及公共舆论围绕这一群体公民权状况的基本维度所展开的话语论争进行了系统研究。

上架建议：新闻传播



ISBN 978-7-5657-1533-4



定价：65.00 元

序：身份和权益

农民工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数量最庞大的社会阶层或流动人群。三十多年来，从农村、农业和农民中分流到城市的农民工群体至少已经延续了两代，但并没有完成从自在到自为的过渡。他们在社会权益和文化身份上成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并成为相关学科研究的重点对象。

黄典林博士的这本著作试图讨论中国农民工的公民身份问题。

公民身份的概念定义是一个不断被讨论却又很复杂的问题，与政治学、法学、哲学和社会学的语境差异相关，可以被看作是连接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想象方式，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也可以认定为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资格问题，被纳入包容或排斥的制度设计讨论；还可以是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利的诉求，即经济福利、社会保障和充分参与社会事务的利益的利益分配机制。简而言之，公民身份的理想目标是让阶级出身、就业职位和家庭背景所构造的社会差异的身份被单一的、共同的公民身份所取代，由此至少有两种理论取向，即“立足于自由主义立场并强调个人拥有的权利最为重要的公民身份理论，与更为强调个人对于更广泛社群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公民共和主义/社群主义方法”。^①

从中国国情出发，作者重点提出了三个问题线索，第一个线索是价值秩序，即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力军的农民阶级的身份

① [英]彼得·德怀尔：《理解社会公民身份》，蒋晓阳译，岳经纶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话语在改革开放前后的连续性和断裂性的问题。第二个线索是身份秩序,围绕着践行多年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身份限制,社会包容和制度排斥的百家争鸣如何被聚焦为一个公共话题。第三个是媒介秩序,即农民工阶层与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资源再分配的接近性差异所产生的话语议程设置,形成有关分配正义、利益表达和身份建构的话语框架。

总体上来说,上述问题的展开构成两个相互交叉的视角:一个是中国当代社会有关农民工的制度安排和社会治理所体现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一个是在媒体实践和公共表达方面,呈现农民工的社会身份变迁、意识形态定义、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资源救助和文化自我意识,由此演绎出各种相应的亚制度板块和亚文化状态。作者试图从取景不同的媒体话语框架中再现农民工,尤其是他们的社会身份建构中的制度性障碍和媒介性机遇所引发的话语论争。

就当今社会的发展逻辑而言,政府、市场和社会是三大机制。而在本书所提示的“社会寓于国家”(society-in-state)的执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逻辑中,政府的政策主导和资源运作的国家治理能力需要一个整体上的制度建构的平衡。如果社会力量弱小,那么社会自治能力的不足就有可能让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抬高行政管理和政策调控的成本,从而在整体上制约市场改革和社会建构的进程。

本书的架构分析力图从观念、制度和话语的三元结构出发来推论和再现农民工的公民权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依赖还原出农民工身份再造的曲折过程,而户籍制度的权利限制和城乡隔离的身份歧视勾勒出社会资源的金字塔景观。在字面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集合之外,公民身份的落实其实是一个社会实践过程,在当今任何国家,这个社会学命题的言说往往都会联系到不平等、利益区隔和社会分层的讨论,不可避免地牵连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不平等问题。

在本书的案例分析中,无论是大工厂的工业心理学困境所引发的非正常死亡,还是农民工子女教育不能被系统纳入公共教育体系而演化的穷二代再生产场景,抑或是出身草根的娱乐明星对主流文化的挪用被解构为商业化娱乐的市场化收编,都不得不引发我们思考农民工的社会权利的内容、类型和形式的问题,以及参与这些事务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组合或介入,相关的各种制度安排和

责任程序问题等等。简单说来，就是工业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议题最后都在拷问农民工群体是否能够通过使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来获取他们希望的社会权利，这种问题意识不仅寄希望于这一群体能够在当下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实现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高度统一，更企盼他们真正成长为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自然化历史进程中的庞大生力军和积极建设者。

是为序。

谭星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6年8月22日

目 录 Contents

序：身份和权益 陈卫星 / 1

导 论 / 1

改革时代的农民工 / 2

移民/人口迁移与媒体研究 / 4

研究问题与关键概念 / 5

各章概要 / 7

第 1 章 改革时代的媒体与农民工 / 11

改革与社会转型 / 11

大变革 / 11

改革的局限性 / 14

传媒制度：变化与延续 / 18

历史渊源 / 18

改革时期的变化和延续性 / 21

中国媒体体制分析的不同路径 / 24

改革时期的国内人口流动 / 28

迁徙权与前改革时代的人口流动 / 28

国家、市场和农民工 / 29

小 结 / 32

第 2 章 公民权、公共商议和话语论争 / 33

公民权及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含义 / 33

西方起源 / 34

中国语境下的公民权观念 / 37

公共领域与商议 / 45

公共领域 / 45

民主商议 / 48

沟通两者 / 51

中国特色的商议政治? / 54

传媒与话语论争 / 57

新闻媒体与公共论争 / 57

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和媒体话语 / 59

公共论争中的话语架构 / 62

移民问题和媒体再现 / 67

媒体和移民研究领域的一般议题 / 67

中国农民工与媒体 / 69

小 结 / 73

第 3 章 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 74

研究问题与分析框架 / 74

研究问题 / 74

相互构成的分析框架 / 77

方法论与分析方法 / 80

架构分析 / 81

历史制度分析 / 85

新闻话语的批判分析 / 87

文本分析 / 90

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语境间的互动 / 92

个案研究和过程描述 / 95

数据搜集方法 / 96

个案、报纸和文章的抽样方法 / 96

报纸抽样 / 96

个案和文章的抽样 / 99

政策档案搜集和深度访谈 / 101

小 结 / 101

第 4 章 农民工的意识形态再造 / 103

历史制度背景 / 104

“工农联盟” / 104

市场化与农民工议题的意识形态挑战 / 106

《人民日报》的农民工议题报道 / 108

党报与《人民日报》 / 108

《人民日报》的农民工议题报道：历时性描述 / 109

命名方式的变迁 / 113

可控人口流动的合法化建构 / 118

控制“民工潮” / 119

新阶级的话语建构 / 125

小 结 / 132

第 5 章 户口论争：融合与排斥的辩证法 / 134

户口制度的政治经济分析 / 135

历史起源 / 135

户口制度的社会后果 / 137

关于户口制度的话语论争 / 140

4 ◇ 公民权的话语建构——转型中国的新闻话语与农民工

定义户口 / 142

围绕户口改革展开的话语论争及其与农民工问题的关系 / 147

危机框架和渐进主义策略 / 147

关于户籍改革具体政策的话语论争 / 150

户口与农民工问题 / 155

小 结 / 159

第 6 章 公民权的话语建构:个案研究 / 161

个 案 / 161

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关于工厂体制的话语论争 / 164

背景 / 165

心理压力框架和个体归因 / 166

军事化工厂体制框架与微观体制归因 / 169

权利贫困框架与宏观体制归因 / 173

“穷二代”的再生产:关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公共讨论 / 176

背景 / 176

媒体报道和公共论争 / 177

“穷二代”的再生产 / 178

“黑学校”与政府责任 / 181

草根偶像:身份建构与文化实践 / 184

背景 / 184

农民工与春晚 / 185

小 结 / 191

第 7 章 结 论 / 193

参考文献 / 199

后 记 / 234

导 论

当代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长期被禁锢的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释放了大量富余劳动力,从而形成了当今中国规模宏大的流动劳动力大军,即一般所谓的农民工群体。在充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固有特征和内在需求。但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新旧体制间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特别是由于计划经济时代人口与社会原子化管理的核心制度——户口制度^①依然在发挥着管理人口、维系社会稳定、界定福利分配边界等诸多功能,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劳动力流动过程因此始终处于悖论性和相对不公正的体制环境之中。户口制度将全体国民人为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基本制度安排,这导致处于不对等权利关系中的农民工无法获得基本的城市公民权。在中国语境下,“农民”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身份标签,在近代以来的价值秩序中处于相对低劣的地位。“农民工”这一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范畴继承了“农民”这一定语的负面意涵,与这一标签所命名的群体的具

^① 当前的户口制度起源于1950年代中后期,其主要目的是控制和调节城乡间的劳动人口流动,并逐渐演变为绝对禁止自发性的城乡人口流动,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一制度的核心本质是要有效服务于指令经济下对不同行政区域间不同的资源分配的严格控制,进而与国民的身份、社会地位、资源和社会流动机会相挂钩。户口制度导致城乡分化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改革开放后,长期以来,户口制度引发了不少争论,也受到严厉的抨击。参见本书第六章相关论述。

体职业活动没有必然联系,更多地成为一种文化和政治属性的身份定位。但无论如何,这一群体在城市主流社会空间中以巨大数量形式存在的基本事实,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象征层面的双重重要性。一方面,这涉及如何定义或重新定义革命意识形态及其阶级话语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中所遭遇的话语裂痕。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如何理解这一群体在努力建构自身主体身份的过程中,对国家和权力话语做出回应。这一群体本身如何面对政治、经济和象征层面的不平等现实中自我主体身份的缺失成为矛盾冲突、戏剧化叙事、政治经济权利斗争和错综复杂的公共话语建构的源泉之一,亦是决策者、媒体话语、学术反思和大众舆论瞩目的焦点之一。从这个角度出发,本书着眼于通过个案式把握公共媒体和其他话语主体针对农民工这一庞大弱势群体所展开的话语表达,来考察当代中国媒体与关涉弱势群体的公共话语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

改革时代的农民工

众所周知,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经济体制的转型造就了“中国奇迹”。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制安排和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相对迟缓,使得中国社会在整体上处于公民权保障的制度化水平较低的状况,特别是对农民工这类在改革进程中逐渐被边缘化的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在此三十多年的时间内,集体农业模式改革所释放的巨大劳动力成为漂流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和他们世代生存的乡村之间的亿万农民工。他们在城里从事建筑工、服务员、保姆、清洁工、小贩等城里人眼中的所谓“又脏又累”的工作,其数量十分庞大。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大约有2亿7395万农民工(国家统计局,2015),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流动人群。

从其出现之初,农村城市间自发性人口流动这一去集体化和市场化改革引发的社会现象就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公众、政府以及媒体的广泛关注。自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并全面启动市场经济改革以来,每年

逐步增长的农民工人数,以及随之而来的与这一新兴现象^①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始终是公共讨论、媒体报道和政府政策制定活动所关注的焦点之一。以“春运”期间的民工潮为代表的大规模人口移动,不仅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象征性缩影,同时也成为新闻媒体和其他不同类型的文本再现的一个持久的话语对象。

中国现有的人口流动管制模式,是从前改革时代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农村城市严格二元对立的户口制度中演化而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体制包含了許多相互矛盾的要素。随着千百万农民从农村自发流向城市,国家机器在改革初期试图努力控制“民工潮”潜在的“颠覆性”力量。最终,两者间的拉锯式博弈关系在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劳动力的强大需求和农民自发寻求新收益来源的驱动下,以农民获得相对“自由地”向城市流动的权利而告终。但与此同时,短期内,进城的农民在现有制度安排中无法找到获取城市户口及其所附带的一系列基本社会福利待遇的途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改变高度僵化的户口制度及其城市公民权制度安排,因此,改革时期的国家对农民工平等公民权的保障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制度条件,从而使其长期处于较为弱势的边缘社会地位。

这种情形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后果,并导致了一系列与对农民工群体的不公正待遇紧密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拖欠工资、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被排斥在城市社群之外、昂贵的医药费用、子女教育问题,等等。围绕农民工群体产生的这些社会不公和矛盾议题,与当代中国发展主义话语所追寻的现代性许诺,特别是与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强调的平等主义价值之间产生了反差,从而对执政者所坚持的核心意识形态原则,尤其是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秩序话语的合法性构成一种潜在的挑战。这些矛盾,不仅需要通过政治经济手段加以解决,同时需要通过文化和象征性手段加以调和,从而修补意识形态修辞中出现的裂痕。

① 这并不是说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人口流动是一个新鲜事物。即便是社会管控僵化、政治不稳定的前改革时代,涉及亿万国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在全国都有发生。但是,与改革后的人口流动相比,改革前的人口流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进行的,是意识形态灌输或政府强制性动员的结果。例如,“文革”期间,数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迁往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关于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徙的变化,参见 Lary, D., 1999。

移民/人口迁移与媒体研究

与移民和人口流动相关的议题,在政府政策和媒介话语的公共论争中,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同时也成为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焦点议题之一。传媒研究及其相关学科(例如,文化研究)已经就媒体如何再现流动工人(migrant worker)^①等弱势群体展开了许多研究。与移民和流动人口相关的研究中,研究者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角度对劳动力社会流动的各个方面展开考察。而媒体与移民研究这一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域,则结合了两者共同关心的议题,着重探讨象征再现和移民与移民群体的社会结构层面之间的关系。

但是,尽管存在一些例外(例如,Florence,2006;Li,2004;Sun,2009),总体来说,大多数此类研究主要关注点是国际和跨文化背景下的移民和人口迁移问题。这些研究大多把考察重点放在媒体在这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上:影响移民群体对迁移目的地的认知和想象,将移民群体建构为文化的“他者”(Others),强化刻板印象和排斥,或者相反,通过互联网和卫星为“高速公路”的全球传播来创造文化身份和散居移民社群(diasporic communities)(Wood & King, 2001)。相比之下,关于在诸如中国这样的特定转型社会中的媒体再现和内部移民与人口流动之关系的研究则比较少见。与跨国移民相关议题相比,在中国这一特定民族国家的语境下,相关研究处于不同的背景条件之中:文化传统较为统一和具有持久性,威权体制较为稳定和强势,经济则日益市场化和全球化。这些差异都对相关研究提出了不同要求。

在中国国内人口流动和移民相关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经济议题,而话语与再现层面的问题则处于相对边缘化的位置。在传媒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一种媒介中心主义的视角。通常研究者所探寻的对象多是一些较为表层的媒介文本的特征,媒体表述中的刻板印象,或者是对文本倾向性的定量描述。相比之下,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和议题架构层面、社会话语

① 英文的 migrant worker 一词,泛指一切在不同地域间流动的工人。本书用“流动工人”泛指这一群体,而用“农民工”来特指中国语境下的流动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

论争的过程以及文本/话语、制度/组织背景和执政党—国家—社会构型之间的关系,则较少触及。

研究问题与关键概念

在上述社会和学术背景下,本书将中国农民工相关的议题作为分析的案例,试图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中各种不同的行动者—言说者(actors-speakers)(包括执政党—国家、市场、社会以及贯穿所有这些层面的媒体行动者)如何通过话语建构对农民工群体所处公民权状况展开表述。主要的研究问题包括:在过去30年的时间内,执政党—国家在不同时期如何对自发性的农民工人口流动做出不同的界定,如何重构了其对农民以及农民工的意识形态再现从而合法化农民工的弱势公民权地位的发展主义现实;作为现有制度安排中公民权排斥机制的核心要素,户口制度及其与农民工的关系在政策与媒体话语中是如何被界定和讨论的;具体而言,围绕着重要的社会事件或政策议题,农民工公民权的主要方面,例如基本的民事、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公共话语中是如何被广泛讨论的。

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是特定媒体和官方政策话语中所再现的关于农民工公民权的公共话语呈现。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层面是不重要的。相反,本书遵循的是一个相互构成(mutually-constitutive)的分析框架,从方法论上来说,对话语建构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相关的制度要素的历史分析是与对媒体和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相互补充的。

这些研究问题中涉及一些重要的概念或术语,有必要在此做出说明。首先,“农民工”这一词汇在英文中常常对应于“migrant worker”(流动工人或移民工)一词。但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一般来说,它指的是跨越地区或国家边界寻求工作机会的劳动力人群。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国内的流动人口通常视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命名方式。这些不同的名称反映了建构这些群体和强调该群体某些特征的特定方式。其中,“流动人口”含义最广,大体上囊括了所有不同类型的跨越传统或现代国家界定的社区和地区边境的人口。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一界定以人口户口所在地的边界为衡量的基准。其中,只有那些起源于农村社会背景,具有农业户口,流向城市寻求劳动工作机会且没